

·文献学苑·

五代十国时期书籍刊刻及其影响

温雪芳 (深圳图书馆 广东深圳 518027)

摘要: 五代十国时期是雕版印刷技术初步兴起、书籍从抄写文本过渡到印刷文本的承上启下时期,受雕版印刷技术推动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五代书籍刊刻取得了相当成就,具体表现为官刻滥觞;刻书规模、种类及数量的发展;技术、人才、印刷物质资源的积累传承等,为后世书籍印刷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五代十国 雕版印刷 刻书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6-0124-04

Research on the Block-printing and Its Influence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Period

Wen Xuefang (Shenzhen Librar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7)

Abstract: Owing to the preliminary rising of block-printing technique,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became a connecting period between former ages and the following, during which books and records went through a transition from transcript to printing.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block-printing technique and influence from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book inscribing during this period got considerably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were: the beginning of official block-pri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ale, types and quantity of inscribed books, the spread of technique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ique, talents and printing material resources. All these achievements had not only latently prepared conditions but also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flourish and development of book printing undertakings in later ages.

Key words: the block-print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Period; book-printing

CLC number: G239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6-0124-04

晚唐五代是雕版印刷逐步兴起的时期,也是中国抄写文本时代过渡到印刷文本时代的水分岭。五代(907—960年)作为唐、宋两个统一的大朝代之间的过渡时期,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文化、社会原因,形成了特有的五代印刷文化,其印刷成就影响深远,为随后到来的宋代书籍刊刻蕴蓄了书籍、人才、文化制度、技术等条件,成为自宋以降中国封建社会书籍印刷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文化环境与书籍刊刻

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北方相继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

权,为“五代”;同时在南方有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闽九个较小的国家,加上存在于北方的北汉,称十国。由于战乱,南北方各国的文化建设和书籍积累受到很大破坏。然而,这一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书籍刊刻事业并未在乱世中停滞不前,相反还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相比唐代,书籍刊刻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刻书地区更加广泛,刻书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刻印者从民间、寺院进入到上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官方机构,开始出现了政府刻书和私家刻书。

书籍生产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总体来说,五代虽是乱世,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原是文化传统最深的地区,虽屡经战乱,也不乏短期的小康时光,

因此在文化上不致完全黯然失色;南方各国由于相对富庶安定,文化繁荣。尤其是江南(南唐、吴越)和巴蜀(前后蜀),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人才辈出,巴蜀以“花间派”为代表的词体文学、南唐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为代表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成就,堪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不朽之作。

就藏书文化的传承来看,五代虽处于乱世,战乱对于国家书籍的聚集造成很大破坏,但大多数小朝廷的统治者仍继承了自汉唐以来重视图书搜集整理的传统。如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6年)世宗皇帝下诏曰:“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并许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11]南唐建国后,及高皇(李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12]与此同时,民间的藏书事业绵延不断。这一时期,寺观、书院藏书以及私人藏书家的存在,为延续书籍与文化起到了特殊作用,使得典籍历经乱世而犹能保持荣光。

刻书事业是技术和社会需求相互促进的产物。自唐代以来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率先在民间得到应用,到五代时技术已较为成熟,应用亦日渐普及,其影响泽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提供了书籍大规模生产的利器。而五代科举制度的延续和存在,成为推动刻书事业兴盛的一个直接动因。唐五代以来,门阀制度进一步溃败,官僚阶层为豪门大族所垄断的状况得到改变,科举逐渐走向平民化,读书的士人人多数,流动性大,随着这些绅士阶层的兴起,使知识传播面更为广阔,社会对书籍的需求日趋旺盛。五代虽朝代更替频繁,各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权,对科举仍比较重视,他们沿袭唐制,设科取士,选任人才。对天下读书人来说,科举是出仕之唯一正途,籍此博取科名,实现经世济民之抱负,因此自然受到高度重视。当时考生必读九大经书,《礼记》《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总字数达数十万字。直到唐末,这些儒家经典仍以手抄本为主,未见有印本。而手抄书对学生的沉重负担也是显而易见的,所有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要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文本一一抄下(朝廷以刻碑立石的方式提供标准教材),或出资请人代抄,或到书肆中购买抄写本,不仅费时费力,且请人代抄或购买的书籍又因辗转传抄容易发生疏漏舛误。随着雕版印刷术在民间的日渐普及,读书人对改变书籍获取方式的需求也日益突出。

雕版印刷术正是在这时得到了统治者的关注。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后唐冯道与宰相李愚上奏唐明宗,请令国子监校印《九经》,奏章中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绝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朝廷于是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校勘儒经,然后雇诏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13]这就是“长兴监本九经”的起始。《九经》

自长兴三年始刻,历经22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方完成。除《九经》外,国子监还刻了《论语》《孝经》《尔雅》,实际共十二种经书。随后针对《九经》之类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藐,传写纰缪,渐失根源”的状况,后唐学官田敏向朝廷进献《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释字正音之书,以方便学者阅读。^[14]

二 五代刻书成就及对后世影响

(一) 开官刻之先河,雕版印刷从民间进入官府

五代刻书成就首先表现在制度和风气上开官刻先河。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仅限于坊间制作,内容多为民间流行的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及字书、小学类书籍,既登不了官府私第的堂史,也不准涉及正经正史等正统图书的圈内。到了五代,监本《九经》的刻印,使雕版印刷因刻印经书而成为替圣贤传言布道不可或缺的工具,具有“播文德于有载,传世教于无穷”的崇高意义,成为一项神圣的事业,从此雕版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产生了政府刻书业。国子监是自西晋以来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儒家经典的刻印由国子监主持其事,即源于这个时期。后周以来国子监多次大规模刻印《九经》《经典释文》等典籍,影响到后世朝野书籍印刷风气的形成。国子监刻书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宋、明国子监刻书蔚然成风,成为官府刻书的主要机构。国子监刻书非常重视底本的选择,谨慎的校勘和优秀书手的手写上板,为后代刻书事业做出了榜样,宋代监本就是五代留下的监本为底本刻印的,宋人称之为“古监本”或“古京本”。

儒家经典的刊刻,既可以达到统一定本的目的,使读书人有标准的读本,更便于快速地大量提供复本,印本书籍相对手抄本书籍,更为廉价,流传更为容易。对于打破知识垄断,使知识普及于市井,意义极为重大。唐五代是书写传播逐渐转向雕版印刷传播的关键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图书形式的主流开始由写本时期进入印本时期。

另一方面,雕版印刷得到政府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印刷术本身的发展。政府刊刻儒家经典,使印刷术应用的范围从隐于民间、寺院之中,开始公露于世,印刷技术所具备的快速、便利、成本低廉的优越性逐渐得到充分体现,在大规模的应用过程中,又不断推动着写、刻、校、印等工序技术的不断提升改进,为其本身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 刻书种类丰富,范围扩大

除国子监刻书外,地方官府刻书事业也始于五代时期。在后唐开雕儒家经典的同时,一些地方割据政权也从事各自的刻书活动。如在敦煌发现的归义军节度使,瓜、沙州观察史曹元忠于后汉乾祐三年(950年)雕印的《金刚经》及单页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像。^[15]还有的文献提到南唐后主李煜曾刻《史

通》和《玉台新咏》等书。^[6]吴越国王钱俶大量刻印佛经,其中《宝篋印陀罗尼经》84000卷,一些残卷至今仍有保留,分别于1917年在湖州天宁寺、1924年在倒掉的杭州雷峰塔、^[7]1971年在安徽无为县宋代舍利塔、1971年在绍兴^[8]发现其印本,可见吴越国所刻佛经流传范围之广。

五代私家刻书者,属后蜀宰相毋昭裔的影响最为深远。《资治通鉴》记载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9]由于毋昭裔本人“酷好古文,精经术”,加上得力于门人句中正、孙逢吉的功劳,组织雕印的蜀本《九经》成为公认的精品。除《九经》外,毋氏刻书还有《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这是历史上最早刻印的大部头文学选集和丛书,开大规模私家刊刻书籍之先河。毋昭裔的业绩又以儒家宣传刻印书籍功德之典型,成为后世家刻之先驱,带动蜀地刻书事业,成都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蜀刻的优良传统在宋代得到直接继承,并得以发扬光大,可以说宋本之“精”是以蜀本为基础的。

五代私人刻书事例较为著名者还有:

唐朝亡后第二年(908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前蜀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年内雕成四百六十余版,藏在龙兴观。^[10]如此大卷帙的私家刻书,远非民间日用杂书可比。

五代仕宦多朝的名臣和凝以刻印自己的诗集为主,据《旧五代史·和凝传》载:和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分惠于人焉。”^[11]肖东发先生认为,和凝是自著、自写、自刻、自印、自发的第一人。^[12]

寺院、僧侣刻书以吴越国最为兴盛。由于吴越国王知书崇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吴越国内寺庙、僧侣所刊佛典,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亦远逾前代。以永明延寿禅师为例,他是吴越国内声望最著的大德,曾奉诏主持灵隐寺,主持刻印了大量的佛经图本,约939年,延寿亲手印制《弥陀塔图》,雕印十四万本,此外又雕印《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等约三十余万本。^[13]吴越国王及其子臣广泛印刷佛经典籍,使吴越都城杭州的印刷业快步发展,成为当时江南最为重要的印刷中心。^[14]

由此可见,五代刻书者,除了唐以来的寺院刻书和民间坊刻书外,还有政府的“官刻”,及由私人出资校刻的“家刻”,坊刻、私刻、官刻三大系统开始形成,这种结构一直延续了千年以上。刻书内容除了儒家经典、佛教两大类外,还有总集、别集、类书、小说和法律书。

(三) 刻书中心的出现及印刷物质资源的积累

五代刻书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刻书地区的扩大,除长江流域外,五代的刻书中心还有北方的青州、南方的福州,以及西北的瓜州、沙州。^[15]但主要的刻书中心仍集中于南方诸国。

由于唐五代以来,随着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诸国呈现政局相对平稳、经济富庶、文化对繁荣的局面,有文献记载的五代印刷事例,大部分集中在南方诸国,其中较有影响的为南唐、钱越、西蜀三国。杭州、金陵和成都成为当时有名的刻书中心,其影响延续至宋代仍能看出端倪。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6]

南方在气候、物产、地理条件上的客观优势,促进了造纸、制墨业的发达。据考证,唐朝设立纸坊后,南方的造纸工业盛极一时,仅四川、安徽、江西、江苏和浙江等地,就有纸坊90余处。^[17]一时期江南造纸业的发达,表现为造纸量大增,而且出产优质纸的地区越来越多,著名的有四川的蜀笺,越州剡溪藤纸、宣歙地区的澄心堂纸等。除纸张外,南唐的安徽歙州一带制墨业发达,最为著名的为李超、李廷珪父子制造的李廷珪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曾出现“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美谈。李廷珪墨直至北宋时仍在使用,一时成为当时书写和印刷的主要用墨。

大规模的书籍刊刻活动,积累了刻印经验,培养了大批书写、刻工、印工等各种技艺湛熟的工人。尤以西蜀刻工闻名天下,王国维在《宋抚州本《周易》跋》一文中,也考证当时蜀人刻工闻名于天下,有蜀人刻工“邹郁”等流寓江右者。^[18]书写艺术和刻书工艺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本书的雕刻工艺之精美,为世人所公认。

五代南方印刷文化的发展和印刷资源的积累,最终并入北宋王朝,在此基础上,北宋的书籍刊刻得以迅速发展。以国子监印版为例,宋初时,国子监印版只有4000,而仅过了半个世纪,到了宋景德二年(1005年),印版就达到了10余万,增加了25倍之多。^[19]北宋统一南方后,朝廷一方面大肆搜罗南方诸国的图书典籍,网罗高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在汲取南方较为先进的印刷技艺,如开宝四年(971年),北宋朝廷在四川雕印《大藏经》,历时13年,雕印经版13万块,5048卷,书写、校对、雕版、印刷、流传所动员和集聚的人力达数以千计。这是我国雕板印刷技术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工程,为其后来大规模的书籍刊刻准备了人才和经验。《大藏经》之所以选择在远离首都开封(东京)的蜀地开雕,也充分证实了四川自中晚唐以来刻书中心的地位,从刻工、技术、纸张供应等方面,具备雕印如此巨部书籍的条件。开宝《大藏经》之后,北宋朝廷又先后开始了其它各种书籍的雕印,“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20]此后,北宋书籍雕印种类、范围之广,堪称前所未有。

(四) 造就了一批精于书籍校刊编纂的才学之士

南方诸国对于书籍编纂的重要贡献还在于提供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文士,尤以南唐的贡献最为突出。南唐在五代时期,相对稳定时间较长,统治者在文化建设上承接唐制,兴科举,办学校,广纳人才,涌现了一大批见于载籍,粲然可

观”的儒者文士。徐铉、徐锴、杜镐、张洎、汤悦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臣名士,不仅以才学为当世所重,饮誉南北,而且在书籍校勘方面有出群之才。北宋平定南唐之后,从金陵所获图书数量甚多,而且书籍质量明显高于其它诸国,据史书记载:“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次全具,与诸国书不类。”^[21]南唐书籍编纂者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据《十国春秋》载,徐锴“少精小学,故所雠书尤审谛。……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22]徐铉是徐锴之兄,也以文学成就和精于书籍校雠著名。徐铉在南唐文坛享有盛名,入仕北宋后受到朝廷器重,奉旨校定《说文解字》,由国子监雕印发布。自北宋以降,《说文解字》之流传,盖以徐铉校本为主。徐铉还主持参与了《太平广记》《说文解字》《道藏》《太平御览》等书的编纂。北宋前期编纂的四大部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除了《太平广记》500卷以外,其余三部皆为1000卷,可谓卷帙浩繁,搜罗宏富。编纂人员中,徐铉、张洎、汤悦、吴淑、吕文仲、王克贞、舒雅、阮思道、杜镐、陈彭年等均为入宋的南唐遗臣;后周文臣有扈蒙、李昉、贾黄中、李穆、赵邻几、杨徽之等。此外,五代书籍编纂校勘人士著名者还有后周薛居正(参与编纂《旧五代史》)、王溥(参与编纂《唐会要》等)、后蜀句中正(参与编纂《说文》等)等。他们为北宋文化建设和书籍编纂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北宋王朝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以及“以文治国”、“儒学复兴”策略的推行,加速了南北方以书籍印刷为主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23]初兴于唐、五代的雕板印刷,终于在两宋之世大放异彩,伴随着两宋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大发展,迎来了中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

参考文献:

- [1] 3(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552.
- [2] (五代)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A].丛书集成初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5:2.
- [4]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83:36.
- [5] 12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8,238.
- [6] 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1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80.
- [7] 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212.
- [8] 13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J].文物,1978(12):74-76.
- [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1[M].北京:中华书局,1956:9495.
- [10] 15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30,131.
- [11]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27[M].北京:中华书局,1976:1673.
- [14] 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211.
- [16]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6.
- [17] 石谷风.谈宋代以前的造纸术[J].文物,1959(1):33.
- [18]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卷3[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831.
- [19] 2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33.
- [21]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0[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9.
- [22]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28[Z].北京:中华书局,1983:404.
- [23] 苏勇强.北宋书籍刊刻与文学[D].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54.
- 作者简介:温雪芹(1969-),女,深圳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服务部馆员.
- (上接第117页)
- 1962:1755-1756,1708,1756.
- [10]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4,2版:69-71.
- [11]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M].成都:巴蜀书社,2002:536-538.
- [1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2版:1161-1165.
- [13] 孔颖达.礼记正义[A].十三经注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本:1536.
- [14] 17孔颖达.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本:1123,270.
- [15] 1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3,1709.
- [16] 邢昺.论语注疏[A].十三经注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本:2525.
- [19]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23-28.
- 作者简介:李江峰(1978-),男,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诗学.